编者的话

教育，像一根敏感的神经牵动着无数中国家庭的悲喜，每当聊起这个话题，谁的心情都不会太过轻松。

童年本该无忧无虑，读书也应快快乐乐，而眼下整个社会似乎患上了“学习焦虑症”。每天一大早，“小二郎”们不再是“背着书包上学堂”——书包实在太沉了，上学路上只能像行李箱那样“拖”着。放学一出校门，不是去操场上荡秋千、池塘边捉蝴蝶，不少学生马上征战另一个“战场”：课外辅导班。

有人问，如今哪个行当赚钱最稳当？我经常脱口而出的是：培训机构。明摆着，那是刚需嘛。

有次参加学校家长会，班主任让一位成绩优秀的学生的家长介绍经验，该家长传授了两大秘诀：一，从来不允许儿子看电视；二，为了配合儿子良好的作息，夫妇俩每晚9点准时陪儿子睡觉。前一条我勉强尚能理解，对于第二条，只想“屈膝跪拜”了。

每每看到那些天使般纯净、稚嫩的脸庞，架着副老气横秋的眼镜；即便是法定节假日，孩子们要么在补课，要么在去补课的路上，我就莫名心疼，进而想：整天抱着书本、试卷啃呀啃、刷呀刷，能“吸”尽知识的海洋吗？

学习自然是件好事，事实上中国孩子扎实的基本功令不少西方人士敬佩。但如何让学生的基础知识转化为提供创新思想的源泉和支撑，如何教书、育人两不误，如何理性看待升学率和录取率……这一切都值得重新审视。相信当越来越多的家长、老师和教育管理部门找到正确路径，中国的学生除了能在诸多国际知识大赛中摘取桂冠，也能在影响世界和人类的重大科研成果中有所贡献。

刊登在这个版面上的文章，均出自我市教育一线教师之手，他们有的是作家，有的还是“网红”；他们现身说法，属于一家之言，并不代表本报观点。

“六一”快到了，聊聊教育这个话题，也算是送给孩子们一份节日礼物。衷心祝愿祖国的花朵们节日快乐！

无题 任山葳 绘

“六一”，聊聊教育那些事

有个女孩名叫清清

王悦微

柳清清这个名字真好听，不过她的脸蛋黑黑的，眼睛小小的，虽然在我看来，她笑起来挺可爱，但离那种肤白大眼的美女标准有点远。坦率来讲，真人没有名字那么美啦。

一个不算漂亮的女孩子，加上成绩也不怎么样，又是老实巴交的性格，在班级里的位置真有点尴尬。五六年级的学生，已经开始朦胧地懂得喜欢异性了，虽然男生们的表达就是去招惹自己喜欢的女生，逗她们尖声大叫出手揍人，他们再嬉笑着逃走——这种方式实在是很幼稚，但若是一个女生从来没有被男生这样招惹，而是在一旁默默地微笑着看别人打闹，这样的少女之初，也真是有点落寞的。

在晓晴的妈妈来告状之前，我没有特别留心过柳清清。一个既不出类拔萃也不惹是生非的小孩，在班级里，或是老师的眼里，似乎是很缺少存在感。有时她因为没写完作业，或是考试成绩不好，被我叫过来批评的时候，也只是低着头不语，安静地听我说，再惶惑而歉疚地看看我，沉默地走回自己的座位。

晓晴妈妈说，晓晴在学校跟同学起了矛盾，本来小孩之间的纠纷，她不觉得有什么要紧，也没过问。但是她跟晓晴去完超市回到家时，发现家门口被贴了警告，语气还挺不客气的，她觉得这事严重了，也很生气，赶紧来找我反映。

我安抚了晓晴妈妈，马上着手调查。结果很快就出来了，因为我认出了那张警告上的字迹，是柳清清写的。

这真让我万分惊讶，在我心中，柳清清这样的女孩，怎么会往别人家墙上去贴警告呢？她平时连当众大声说句话都不敢啊。

我把她叫来问话。她支吾了很久，终于说出来了：“是陈洁叫我写的。”

“陈洁为什么叫你写？”我问。

“因为……”她迟疑了一下，说：“陈洁她们几个，跟晓晴关系一直是不太好。她们说晓晴在背后说陈洁坏话。”

小小的女孩子们，竟也有这样汹涌的暗流，不过也不奇怪，女孩们的小团体，我们那代学生里也不少见啊。我觉得有些好笑：“怎么陈洁叫你写，你就写？你自己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她看了看我，低下头，不说话了。

我看她局促不安的样子，也就没多问她，摆摆手，让她下去了。

后来，问了其他的女生，我才知道，陈洁成绩好，在这个小圈子里比较强势，属于核心人物，而柳清清为了讨好她，也为了自己不在女生圈子里太孤立，平时就会常常买零食给她们吃，还时不时慷慨地送些礼物。这次在晓晴家门口贴警告，就是陈洁的主意，只不过，她们指派了柳清清去做这事。

知道了真相后，我感到很难过。真的，不是为小孩做错了事，而是为柳清清为了在这个圈子里能争得一点存在感，而这样委屈自己，去讨好别人。我想起以前班级里搞跳蚤市场，让学生们捐点小玩意，她总是会买来很贵的东西，然后慷慨地捐给班级。上一次，她捐的是一条价值一百多块钱的珍珠手链，在学校附近的小店买的，那是女生们都向往的珍宝啊。当她把这条手链交上来的时候，全班女生都沸腾了，发出了哇哇的惊叫声。那一刻，从讲台上走下去的柳清清，虽然笑得一如既往的腼腆，但脸上绽放出多么高兴的神采啊，那种把整张脸都映亮的神采，是平时很难在她身上见到的。

为了买这条价值不菲的手链，她要省上很久的零花钱吧？

我把她叫来谈话。

“你真傻！”我忍不住这样直接地对她说，“你有你的优点，更有你的尊严，你真的不必这样去讨好别人。成绩不算什么，真的，你真诚、善良，我一直都很欣赏你。”

说这话的时候，我觉得很想哭。也许，是因为她让我想起了我曾经在童年里也有过的卑微感吧。

她抬起头来，很快地看了我一眼，又很快地垂下头去，然后，轻轻地点了点头。

“每个人都需要朋友，都渴望友谊，但这个友谊应该建立在平等、真诚的基础上，不是靠礼物去收买的。”我拍了拍她的肩膀，“开心点，以后也要多用功，成绩好一点，确实能让一个人更自信些。”

我不知道这番话她有没有真的听进去，也可能是自己对柳清清更多了一分关注，而在以前，真的太忽略这个安静的女孩，我仿佛用一种全新的眼光来打量她，来观察她：下课的时候，她笑的时候多了，有时上课也敢举手了，班级活动，她参与得多了，和陈洁她们，她还是经常在一起玩。在这件事中，我也批评了陈洁，小孩毕竟还是纯真的，陈洁也有了很大的转变，她对班级事务热心多了，我也明显感到，她在和同学的相处中，少了之前的那份霸气，而多了真切和热情。

对于一个老师来说，还有什么比看到一个孩子美好灵魂的成长而更有价值感的事呢？我觉得我的内心里住着一个大侠，在班级这个小小的江湖里，我要努力去实现一种自己认可的公平和正义。

那个“度”，不能过

岑燮钧

前一阵子，我发了一次烧。照以往的惯例，须会去医院打点滴。但我知道，我其实只是普通感冒，没别的症状。于是，我只吃了点退烧药，多喝水，三天之后，烧果然退了。可见，像我这种情况，打点滴，配三四种中西药，是多么没必要。过度医疗，它唯一的好处，是给医药产业作贡献，留给自己的却是毒副作用。

与过度医疗一样的，是过度教育。如果说治病救人我还是外行的话，那么教书育人却不能说是门外汉。二十多年的一线教书生涯，让我深深体会到了过度教育的“毁人不倦”。刚教书那会，走进静静的校园，我内心总感到一种神圣的意味。如今，看到操场上生龙活虎的学生，我会感到欣慰；如果操场上空无一人，整个校园一片寂静，我内心会感到一阵痉挛：什么时候他们才能放风啊！

凡是成绩优异的名校，很多学生有不足为外人道的痛苦经历。

与学生对学习成绩和名次的焦虑一样，作为教师，我内心也充满了对教育的担忧。想当年，我是多么受学生欢迎，学生回忆必有我，因为我幽默，我“扯淡”，让他们感到快乐。而现在我走进教室，第一句就是“翻开检查本，我们检查昨天学过的知识”，上课不扯淡，句句都是正经内容。其实，这样正儿八经密不透风就好吗？可是我没办法。因为我处于被人排名次的地位，而一旦排名次，什么都不用说了。我也不怪校长，因为校长也要被排名次！

于是，教书育人简化为分数。为了期末考有个好成绩，你知道我给学生复习了多少时间——整整一个月！而一学期才几个月呢？如果专家说我的方法是错误的，我承认。可是，我们面对的是参差不齐的学生啊！三五个优异的学生，早已应对自如；而更多的学生，却是丢三落四。不是“一个都不能少”吗，优秀率，及格率，平均分，都等着你呢。光是古诗词背诵，我就默写了三遍。我得让每一个人都过关，都全对或接近全对。只要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学生是筛选过的。无奈，我们只得赶着鸭子上架。

虽然，教育主管部门三令五申不准排名，但事实上排名次以各种不同的变通方式一直存在着。为了“分数”，父母送子女上各类培训班。有的父母，业余生活就是接送子女学习。甚至，有的母亲的全部工作，就是管孩子读书。这样做，美其名曰：无私奉献。但倘一代代父母自己一事无成，那么我们的教育又为了什么呢？学校教育已经过度，家长却又推波助澜。过度教育，一是使人文弱，二是使人麻木——他们都成学习的机器了！

那么，过度教育的根子在哪里呢？很多人会怪到我们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上。没错，我们的民族在对待教育上，的确不惜血本。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加固了这样一种集体无意识。据说，一些领导看成绩单，犹如看经济数据。可是，教育GDP背后的人的异化，难道不可忧吗？

教师、家长和有关主管，合力为教育“添砖加瓦”。如此层层“过度医疗”。其实，这只是增加了无谓的教育成本，抬高了教育竞争的底线，增加了全民的教育焦虑。那么，怎么办呢？我觉得我们的教育，也需要精兵简政，少管分数，少作统计，天天念紧箍咒，连孙悟空都吃不消啊。

——我读过很多书，但后来大部分都被我忘记了，那阅读的意义是什么？

——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吃过很多的食物，现在已经记不起来吃过什么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我的骨头和肉。

——佚名

想像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像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

——爱因斯坦

教育的最大的秘诀是:使身体锻炼和思想锻炼互相调剂。

我们在路上不是像驿夫那样追赶路程，而是像旅行家似的沿途观赏。我们心中不只是想到一个起点和终点，而且还想到起点和终点之间相隔的距离。对我们来说，旅行的本身就是一种乐趣。

——卢梭

我读《小舍得》

王梁

儿子所读学校给家长们布置了一个作业——读鲁强的新近力作《小舍得》并写读书心得。一开始不明白为了什么，及至读完，揣摩大概是为了缓解家长们的焦虑，或许有助改善当下的教育生态。

鲁强在创作《小舍得》前曾专门到宁波体验生活、走访调研，所以小说的情节安排、细节描写给人似曾相识之感。小说较为真实地反映了当今社会诸如上学难、择校热、学业负担重、校外培训乱象等热点问题。透过作品，我们至少能看到两个社会面。

一是焦虑的父母。整本书里你几乎找不到一对不焦虑的父母，都在催促孩子，拼争资源，忧心忡忡，心急上火。南丽和夏君山这对高知夫妻一开始算比较从容淡定，想着要给孩子宽松自由的成长环境，反正对口的公办小学、中学都还不错。然而当他们无意中得知 “幼升小”“小升初”的现实状况，原本平静的生活和心态立马倾斜，不得不进入家长们普遍认为“合理”的节奏和轨道：赶着孩子上各种各样的培训班，打探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排队、摇号，甚至为了孩子的升学动起了假离婚、换房、大学教授辞职到小学任教等等念头。

父母们的基本逻辑是：人家都在学，自家孩子不跟着提前学、拼命学，到了学校就会跟不上，会不断受挫，自信心和学习劲头就会严重受损；小孩子不跟着挤上一所优质（民办）学校，好的会更好，差的会更差，相当于被分出了不同阶层。这样的思路听上去合情合理，所以作为爱护孩子的父母，怎能不殚精竭虑，尽可能为孩子创造良好条件？

二是异化的教育。充斥在小说里，或者说充斥在欢欢、子悠等孩子童年生活中的是没完没了、五花八门的补课、培训、刷题，好像有一种揪心的力量在鞭打他们以及他们的家长，他们被驱赶进一个狭窄而压抑的空间里，被束缚住本应蓬勃灿烂的生命。

我没有统计这本书里出现的培训机构数量，其繁盛程度恰如现实中各种挂着“××教育”牌子的培训机构开遍大街小巷一样，俨然已经成长为一个体量巨大的产业。一个体制内的老师辛苦一年所得收入与一些校外培训机构动辄以数十万、百万计的年薪形成极大反差，折射了功利、拜金以及学校教育内外的诸多问题。学生鲜活的生命及其成长成为一种工具、一枚棋子，包括培训机构、所谓的优质（民办）学校、不安生的教师个体都会精明熟络地将家长们的焦虑变现，轻松赚取高额利润，教育异化现象愈趋严重。那些博士都不一定做得出来的面试题目，那些幼儿园就开始的不断超前的“搞脑子”训练，只不过是教育变本加厉异化大潮中的几朵浪花而已。

这本书的结尾，夏君山在长久的委曲求全中终于忍无可忍，他舍不得一双儿女的童年被掠夺、消磨，因为“每一个人都该有自由的灵魂、个性、无畏、生命的想象，还有野性”，他擅自带上欢欢和超超说走就走，飞赴泰国，他要给焦虑疲惫的自己和孩子好好做个深呼吸。最焦虑的南丽也被唤醒，追随他们的行列。

读过此书的人应该都会记得夏君山的发现：“在浩瀚的大海和天空面前，人很渺小，我们每天担心的那些事，就更小了，而试卷上比别人少得1分、2分，就是更小更小的一点点了。”我想这句话会给很多焦虑的家长带来长久的抚慰，并促进他们自我觉醒。

不肯被罚站的男孩

易新琴

（一）

这个故事发生在我新接手的一个班级。

那天踏进教室，就看到一片“森林”，正感到惊异，班长气呼呼地告状了：“老师，班里太吵，我让大家都站着反思，可就他不站!”

所有的眼光都愤怒地戳在那个男生身上，凭什么我们都站，你不站？男生是个倔强的学差生，低垂着头，显然有些顶不住了。

教室里阒寂无声，大家像在等待一场激烈的搏杀。我平静了呼吸，走到他跟前：“你没有吵闹对吗？”

“嗯。”男生头更低了，声音像蚊子叫。

“好样的，你当然有权利坐着，而且要抬起头，挺起胸膛。”我拍拍他的肩，走回讲台。

“现在认为自己同样没有吵闹的，可以坐下！”我说。

大家面面相觑，显然我的话有点出乎他们意料。但很快，一个接一个地坐下，只剩几个看来确实吵闹过的学生还站着。

我提高声音说道：“虽然这节课纪律不太理想，但老师还是要夸奖一些同学，首先是不肯站的这位，他没有错，为什么要站？他凭什么要为别人的错误买单？你们应该像他一样，坚持自己的正确，而不是随大流。”

“其次，”我接着说，“老师要表扬这几位吵闹的同学，你们还站着，说明你们愿意承担自己的过错，而不是逃避。老师喜欢有担当的学生！”

那一节课，我看到所有学生昂首挺胸，那个倔强的孩子眼睛晶亮柔和，听课特别认真。

没有想到，那位“不肯被罚站”的男生从此喜欢上了我的课，课堂上非常活跃。一次语文课上我要求按照朱自清写春雨的句子来仿句，这孩子给了我一个难忘的答案：春雨像大宝SOD蜜，滋润极了。

几年后，他来看我，一脸傲娇地告诉我在职高汽修班学习期间，代表学校参加了汽修方面的全国比赛，获了奖，现在被高端汽车4S店高薪聘用。说这话时，阳光正撒在他长满青春痘的脸上，蓬勃而饱满。

（二）

前些年，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一档纪录片火了，原来是英国一所高中邀请五名优秀的中国教师到该校进行一个月的“中国式教学”。所有课程都由中国老师来上，做眼保健操、升国旗、每天在学校呆上12小时，这些中国中学生都熟悉的生活常态，却成了英国学生的“灾难”。他们无法适应高强度教学，十分抵触。

一场关于中西方文化冲突和教育方式优劣的争论，一时间在中英两国教育界硝烟弥漫。

关于这场争论，自有专家研究定论，我不再赘言。这里倒是想说说关于个性的话题。

早就听说国外的孩子上课比较自由，可以吃东西、讲话，甚至随便走动。这在国内的课堂绝对是严厉禁止的。

国内学校新学期开始一般先上行为规范课，上至校规，下至班规，逐项明确。然后学校一系列的班级考核细则，开始付诸实施。学生迟到扣分，上课铃声响了还没安静扣分，下课追逐打闹扣分，到食堂排队时插队、敲碗，餐桌有米粒没清除皆扣分，诸如此类的扣分项目竟然有几十种之多。

为此，班主任全力以赴，抓典型，勤教育，软硬兼施。如有屡教不改者，罚抄写，罚站，写检查，打电话给家长，更有甚者，停课反省，各种惩罚手段层出不穷。终于，那些“旁逸斜出”的孩子“归类”了，成为集体中合格的“产品”。

英国教育学家斯宾塞有一句话说得好：“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的个性。”而我们身边却常听到这样一句话：孩子就像树木，不修剪不成才。这句话固然有一定道理，但一个被剪掉个性的孩子，往往怯懦和迷茫，只会亦步亦趋地前行，无法自信地迎接未来。这样的孩子多了，一个民族又怎么能拥有巨大的创造力？

教育不应该是一把剪刀，而应该是一片阳光雨露，让孩子们枝繁叶茂，茁壮成长吧！